

中华玉文化中心  
中华玉文化工作委员会

编

# 玉鬼国魄

红山文化玉器精品展

ISBN 978-7-80715-500-3



9 787807 155003  
定价：198.00元

中华玉文化中心  
中华玉文化工作委员会 编

# 玉鬼国

——红山文化玉器精品展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 数据

玉魂国魄：红山文化玉器精品展/中华玉文化中心，  
中华玉文化工作委员会编.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80715-500-3

I. 玉… II. ①中… ②中… III. 红山文化—古玉器—中国—图录 IV. K876.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05668号

# 玉 魂 国 魄

## ——红山文化玉器精品展

中华玉文化中心 编  
中华玉文化工作委员会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电话：0571-85068292)

网 址 www.zjguji.com

封面题签 费孝通

责任编辑 郎震邦

封面设计 刘 欣

图片拍摄 林 利

制 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10.25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5-500-3

定 价 19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编辑委员会**

**主任:** 张忠培

**副主任:** 朱金坤 鲍贤伦 关 强 姜 军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宝杰 田立坤 朱金坤 刘 斌

关 强 杨 晶 吴立炜 沈旭微

张俊杰 陈官忠 姜 军 郭大顺

郭青岭 蒋卫东 鲍贤伦

**执行主编:** 郭大顺 蒋卫东 郭青岭

## 祝　　辞

奉献与观众的这个“玉魂国魄——红山文化玉器精品展”是红山文化玉器走出家乡,于我国境内第一次而且是最具规模的一次集群亮相。

红山文化的家乡在西拉木伦河及燕山南北地区,距离我们杭州市余杭区很远。这一地区在余杭区的北方,我们要跨过长江、黄河和走过河北省的大部分地方,才能到达。曾对周边文化发生过巨大文化影响的红山文化,存在于公元前第五千纪的后期至公元前第三千纪初期前后,并于公元前第三千纪前期转化为小河沿文化,最终融合于中华文化之中。这些事实虽曾被中华民族忘记,但我们感到幸运的是,考古学家用手铲层层地将其揭示出来,并升华为历史的认识。

考古学家还将这曾存在于中华历史之中一千几百年的红山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的年代,处在后冈一期文化、半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阶段;中期的年代,和刘林期大汶口文化、西阴文化及崧泽文化相当;晚期的年代,处于花厅期大汶口文化、半坡四期文化与良渚文化前期时期。同时,还认为红山文化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文化沉积与发展之后,在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年左右,建立了如牛河梁(此地点在辽宁朝阳市凌源和建平两县的交界处)那样宏伟的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玉文化,迈入了文明时代的门槛。当我们说中华文明已存在五千年的時候,就已将红山与良渚这样的文明计入其中了;否则,中华文明哪有五千年啊!

红山文化的玉文化很了不起,是与良渚玉文化并列的中华玉文化的另一源头。之所以将红山文化玉器在良渚博物院展出,不但是为观众提供能对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玉器作对比观察的条件,更是让观众受红山文化玉器感染,激活心灵,化传统文化为文化传统,同时吸纳现今世界上的优势文化,去从事新文化的创造。

原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华玉文化中心主任 張忠培

2009年10月19日成稿于小石桥

## 祝    辞

值此“良渚论坛”——第二届中华玉文化论坛召开之际，在良渚博物院举办“玉魂国魄——红山文化玉器精品展”，这是弘扬中华玉文化、传承华夏文明的一件文化盛事。在此，我谨代表余杭区委、区政府对展览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有着用玉、爱玉、崇拜玉的悠久传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玉”曾被赋予了政治、文化、宗教等多层含义，凝聚了中华文化的精粹和审美意识，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玉文化。千百年来，这种文化因子已然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形成一种与生俱来的独特情怀和风尚习俗而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玉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标志之一，是中华文化中光彩夺目的一页。

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并称中国史前两大雕琢和使用玉器的中心，代表了当时玉器制作的最高水平，并以庞大的数量、丰富的品种、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雕琢工艺，备受国内外学界的重视，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关键所在。良渚、红山玉器是代表中华文化精神气质的和谐之器，是中华民族执著与创新精神的生动体现，这种精神要发扬光大，要在弘扬中华玉文化的同时，肩负起传承中华文明这一重大的历史责任，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不竭源泉。此次在良渚博物院举办“玉魂国魄——红山文化玉器精品展”，正是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坚实一步。

此次红山文化玉器在良渚展出，南北两大史前文化的玉器首次拥抱在一起，合璧于此，希冀全面、完整地将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神圣而精致的玉器及深厚的文化内涵呈现给广大观众，让观众在近距离欣赏的同时、比较两大文化的独特个性。作为后人我们应该感到庆幸，能够亲眼目睹先人留下的精美玉器，在交流中共享历史馈赠的文化大餐。希望通过举办此类展览，为世界各地爱好玉文化、研究玉文化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为更好地弘扬中华玉文化，促进国际玉学交流，推动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贡献新的力量。

最后，我谨代表余杭区委、区政府向为此次展览提供协助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辽宁省博物馆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为本次展览和图录编辑工作付出极大辛劳的工作人员致以深切的谢忱！预祝本次展览圆满成功！

中共杭州市委常委、余杭区委书记  
良渚遗址管委会党工委书记



2009年10月

## 祝　辞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博物馆与良渚博物院联合举办的“玉魂国魄——红山文化玉器精品展”，是红山文化玉器第一次在辽宁境外的大规模公开展出，对此表示衷心的祝贺。

红山文化是我国北方地区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距今约6000～5000年。老哈河中上游到大凌河中上游之间是红山文化的中心分布区，这里不仅宜农宜牧，也有渔猎之利，自然条件优越，多种经济方式的相互补充，及与周边文化的广泛交流，造就了一支繁荣昌盛的古文化，放射出照亮中华大地的第一道文明曙光。

牛河梁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积石冢群、女神庙、神像群和大批玉器，为同时期中国诸史前文化所不见或罕见，显示出其所具有的重要价值。由金字塔式建筑、结构复杂的女神庙和积石冢所组成的规模宏大壮观的建筑群址，精雕细琢、巧夺天工的玉器，数量众多、器形奇特、彩绘纹饰丰富神秘的陶器，形象逼真、雕塑艺术高超的神像，都说明当时社会分工和专业技术工匠队伍的形成，等级的存在与社会的分化，神权与政权相结合，甚至出现一人独尊的现象。牛河梁遗址是一处专门的礼仪祭祀中心，所反映的礼仪制度和哲学观念对后世的影响之巨大，延续之长久，可谓是中华传统文化之源。

“玉魂国魄——红山文化玉器精品展”将种类丰富、工艺精湛的红山文化玉器展现给广大的观众，定能使更多的人领略到红山文化玉器的神奇魔力。祝本次展览取得圆满成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田立坤

2009年10月

## 祝 辞

远在新石器时代，生活在辽河流域的先民们就创造了灿烂的文化。20世纪80年代，尘封五千余年的辽宁朝阳牛河梁“坛庙冢”三位一体大型史前祭祀遗址群以及彩陶和玉礼器的发现，昭示了辽河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

文物是人类文明的载体，是人类生产生活与进化的物证，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是人类最可珍视的共同文化遗产。保护遗产，传承文明，普及文化，启迪民智，陶冶性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人类文明进程，是博物馆永恒的职能命题。

展览是博物馆面向社会推出的主要文化产品，是博物馆服务大众的重要实现方式。充分整合文物资源，策划举办适应不同层次观众需求的丰富多彩的展览，成为当今每个博物馆的中心工作。通过馆际交流合作，实现文物资源共享，丰富阵地展览内容，增强展览的吸引力，提升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已成为文博战线同行的共识。

辽宁省博物馆是国内大型历史艺术博物馆之一，建馆六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保护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人类先进文化。在展览工作中，特别注重馆际交流与合作，多年来已向国内外博物馆推出数十个馆藏文物专题展，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玉魂国魄——红山文化玉器精品展”是辽博联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推出的红山文化专题展，是首次以红山文化玉器为主题的展出。展览将对红山文化的展示宣传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感谢良渚博物院的盛邀与合作！向辛勤筹展的同行们致敬！预祝展览圆满成功！

辽宁省博物馆馆长 马宝杰

2009年10月

## 祝 辞

中华玉文化源远流长，积淀丰厚，内涵深邃，影响深远。2000年，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以“玉魂国魄”四个字，概括出中国人对玉情有独钟的特殊心理感受。在费孝通先生的倡导下，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的综合研究，已成为中国考古学、美术史、科技史等众多学科共同致力的课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由中华玉文化中心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先生策划的“‘玉魂国魄’系列展”，是弘扬中华玉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并将中华玉文化的研究继续引向深入的重要举措，由良渚博物院来承担这一重大题材的展陈任务，我们倍感荣耀。

“红山文化玉器精品展”是“‘玉魂国魄’系列展”的首展。根据考古资料，中华玉文化至少有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但为其奠定基调的却是大约始于公元前4000年而终于公元前2000年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时期，随着专业化制玉作坊的出现，玉器的制作和使用突飞猛进。在制玉工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境内形成了以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江淮地区的凌家滩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中原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与中原诸龙山文化、珠江三角洲的石峡文化以及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等为代表的数个特征明显的玉器文化系统。各玉器文化系统内，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的软玉（“真玉”）逐渐成为最受看重的玉材，从而奠定了后世玉器的选材标准。诸多超越人体装饰功能的玉器新器形与取像于神异动物的玉器新纹饰、新造型相继出现，社会少数精英阶层攫取绝大部分玉器、垄断某些特定玉器器形、独占玉器上神异动物肖像权的现象日益普遍，不仅赋予玉器强烈的神灵崇拜色彩，同时也使玉器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政治领域中权力与财富最主要的物质表现形式。不同形制、不同纹饰、不同数量、不同组合的玉器，已然成为拥有者在世俗社会中身份、地位、职能、等级和权力的最主要标签，其中玉钺更是各玉器文化系统中被广泛认同的军事和政治领域的权力象征。可以说，正是在这一时期，玉与玉器开始全面脱离“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命运，而荷载起“形而上者谓之道”的社会政治功能和精神文化内涵，从而为成就生生不息的中华玉文

化神话奠定了基石。

“北红山，南良渚”，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北南辉映的两大玉文化系统，是当时中国境内玉文化系统中最流光溢彩的两处。以玉猪龙、勾云形玉饰、玉鸟形佩、玉龟等丰富多彩的动物造型为主流的红山文化玉器，以琮、璧、钺等种类丰富的玉礼器为主流的良渚文化玉器，既体现着某些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制作与使用的共性和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反映出不同区系类型考古学文化之间玉器功能与观念的差异；既同为疏解苏秉琦先生“多源一体”形成过程与“满天星斗”复杂状况的中国文明起源理论的重要实证，又表现出半牧半旱作与稻作农业生产方式的差异所导致的精神文化内涵的区别……因此，联袂展出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的玉器，是文博界和古代玉器研究界由来已久的心愿。此次“玉魂国魄——红山文化玉器精品展”在良渚博物院的展出，首次实现了两大文化玉器的同台亮相，其意义当已超越了博物馆馆际交流与合作的目标。

为此，衷心感谢张忠培先生的精心策划，感谢郭大顺先生为筹展所作的辛勤努力，感谢杭州市余杭区委、区政府和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对展览的大力支持，感谢辽宁省博物馆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玉成美举，感谢杨晶女士、何建娣女士、郭青岭女士、孙海波先生、罗晓群小姐等同行的奔波筹展、辛勤付出。衷心祝愿展览圆满成功！

良渚博物院院长 蒋卫东

2009年10月

# 红山文化玉器概述

郭大顺

玉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这一文化现象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红山文化玉器就是其中代表之一。

—

红山文化以内蒙古赤峰市东北郊的红山后遗址而得名（图1）。该文化以彩陶（母题有具仰韶文化特征的勾连花卉纹、具西部特征的几何纹、自身创造的龙鳞纹）和具东北文化特征的饰压印“之”字纹筒形罐共出（图2-1～2），细石器（凹底等腰三角形簇等）、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石耜、石磨盘、石棒等）并重为主要内涵。聚落有依山川分布、小遗址围绕大遗址的遗址群组合规律，房址内窖穴出土成套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有围绕聚落的壕沟，还发现有烧制单一陶器的陶窑。该文化反映的是农牧渔猎采集并存的经济生活，发展程度较高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和以当地为主吸收南部农耕文化与西部草原文化先进因素的文化演变规律。

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东至辽河；南界东段达渤海沿岸，西段越燕山山脉到达华北平原北部；西界在河北张家口地区的桑干河上游；向北在内蒙古兴安盟的霍林河仍有分布。它以老哈河中上游到大凌河中上游之间为中心分布区，主要年代跨度为距今6000～5000年（图3）<sup>[1]</sup>。

红山文化虽然发现较早，但由于缺少大规模发掘和成批资料的积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



图1 赤峰红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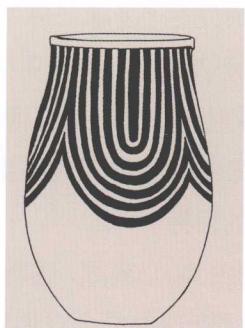


图2-1 赤峰蜘蛛山遗址出土的龙鳞纹彩陶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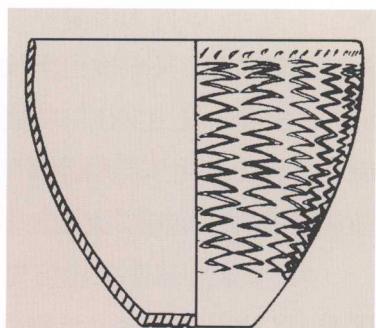


图2-2 红山文化饰压印“之”字纹筒形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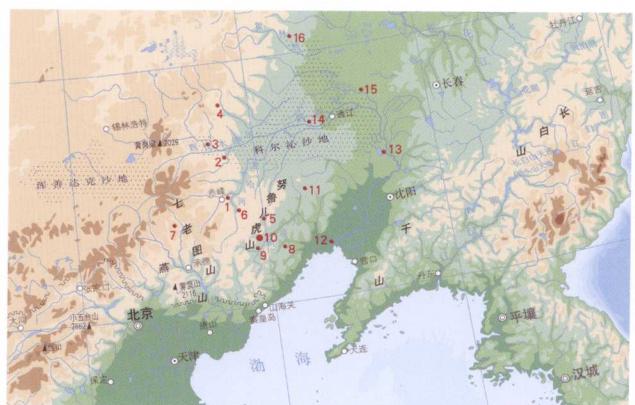


图3 红山文化遗址分布图(1.红山后；2.赛沁塔拉；3.那斯台；4.尖山子；5.四家子；6.五十家子；7.下伙房；8.沙锅屯；9.东山嘴；10.牛河梁；11.胡头沟；12.盘锦市郊；13.康平县郊；14.坤都岭；15.新艾力；16.嘎查营子)

[1] 郭大顺：《红山文化》，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视为边远地区的一支史前文化。红山文化被重视起来,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红山文化的一系列考古发现有关,玉器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发现。

红山文化玉器在20世纪初已见著录<sup>[1]</sup>,并为海内外一些大博物馆收藏<sup>[2]</sup>,还有傅祖谋家藏的一批<sup>[3]</sup>,其余多为零星收集品,都没有明确出土地点。由于这批玉器在造型和工艺上都有相当的进步性,且近于商周玉,时代一般被定在商周时期或更晚,但人们也已注意到其所表现出的原始特征<sup>[4]</sup>。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辽宁省和内蒙古赤峰地区的文物部门不断收集到这类玉器,其中有勾云形玉(佩)、斜口筒形玉(箍)、兽形玉、钩形玉,甚至还有玉虎、玉戈形饰等。它们均出自内蒙古赤峰市、哲里木盟,辽宁西部的阜新、朝阳地区和河北承德地区,别处不见,这就让人将探求这批玉器出土地的注意力,集中到辽宁西部及其相邻的内蒙古东南部和河北西北部地区。尤其重要的线索是,1973年那一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和辽宁阜新县,连续发现了有明确出土地点的玉器,这就是赛沁塔拉的大玉龙和胡头沟的玉龟、玉鸟等。

赛沁塔拉(原称三星他拉)大玉龙的出土地赛沁塔拉村在赤峰市以北百余公里,翁牛特旗所在地乌丹镇西北约10公里处。村北有群山,山南为一片开阔地。玉龙的出土地点在山的南坡,未见明

确墓葬,只在玉龙出土范围内和到山顶一带,采集到红山文化的泥质红陶片、饰压印篦点“之”字纹陶片、石耜和石磨盘、石磨棒等<sup>[5]</sup>。

胡头沟在大凌河支流牤牛河右岸,地属阜新县化石戈乡。收集到的玉龟、玉鸟、勾云形玉(佩)、玉棒、三联璧、玉珠等出土于一座石棺墓中,其上叠压着春秋时期的墓葬。经清理,周边有石墙和排列成圈的泥质红陶绘黑彩的无底筒形器群,还发掘到一座内分五室的石棺墓,随葬有三联璧、绿松石质的鱼形耳坠等<sup>[6]</sup>。

进一步的考古证据是1979年在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和凌源县三官甸子墓葬发掘出土的玉器。东山嘴为一处单纯的红山文化遗址,该遗址出土的玉器中,重要的有双龙首玉璜和绿松石质鸟形饰各1件<sup>[7]</sup>。三官甸子(后归入牛河梁遗址,被编为第十六地点)玉器出在一座大型石棺墓和近旁小墓中。大墓共出土9件,其中大型勾云形玉(佩)、斜口筒形玉(箍)、简化型玉鸟各1件,其余为玉璧和玉珠;附近墓中还出土有玉棒和兽首三孔器<sup>[8]</sup>。

以上玉器群特征和出土情况逐步明朗后,红山文化玉器基本可以确定了。这一研究成果在1981年12月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上进行了公布,1984年在《文物》上发表后,很快在海内外引起反响<sup>[9]</sup>。

不过,红山文化考古史上最为重要的工作,

[1] 黄濬:《古玉图录初集》,1939年北京尊古斋影印本;王梅生:《1980年前欧美所藏红山玉器》,1993年8月在赤峰举办的“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2] 国外所藏如美国华盛顿弗勒尔博物馆收藏的勾云形玉(佩),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收藏的饰龙鳞纹斜口筒形玉(箍),法国吉美美术馆和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的玉雕龙,详见邓淑苹《谈谈红山系玉器》,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第189期(1998年)。国内主要有辽宁省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的藏品,以及辽宁省文物总店、赤峰市文物店近年的收购品,详见《中国玉器全集》第一册《原始社会》,河北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

[3] 傅熹年:《古玉掇英》图7,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版。

[4] 见王梅生《1980年前欧美所藏红山玉器》;又见尤仁德《商代玉雕龙纹的造型与纹饰研究》,《文物》1981年第8期。

[5] 翁牛特旗文化馆:《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玉龙》,《文物》1984年第6期。

[6] 方殿春、刘葆华:《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文物》1984年第6期。

[7] 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8] 李恭笃:《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86年第6期。

[9] 孙守道、郭大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文物》1984年第6期;杨建芳:《红山文化玉器——前所未见的中国史前古玉》,《中国文物世界》1985年第8号;邓淑苹:《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玉器篇》,台北“故宫博物院”1985年版。

是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红山文化玉器的最终确认和研究,也是从牛河梁遗址正式发掘开始的。

牛河梁遗址位于建平与凌源两县交界处一绵延十余公里的黄土山梁地带。1981年文物普查时为寻找红山文化玉器的出土地而被发现。1983年开始发掘。目前已在约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43个地点,正式编号的有16个地点。它是以主梁顶的女神庙和山台为中心,四周山冈各有积石冢群和祭坛围绕而共同组成的遗址群(图4-1~5)。每个山冈有一冢、双冢或多冢的组合。冢有下、上层之分。上层冢规模大,以石块砌筑整齐的冢台和冢界,形成方形、长方形、圆形以及方圆结合形等



图4-1 牛河梁遗址群鸟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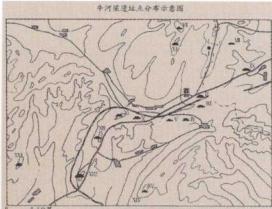


图4-2 牛河梁遗址群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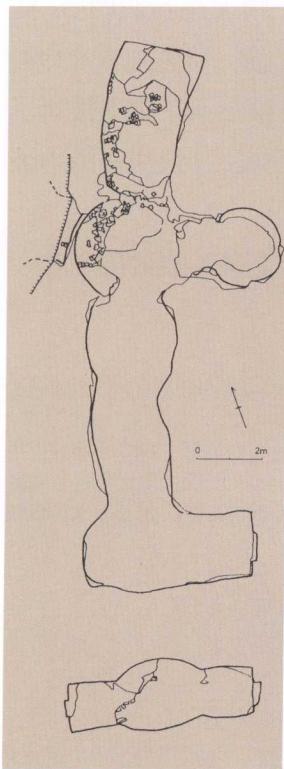


图4-4 女神庙平面图



图4-3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  
女神庙



图4-5 女神头像出土情况



图5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  
积石冢群



图6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  
1号冢4号墓

多种形式,占地面积在200~400平方米左右(图5)。冢内墓葬成行排列,都为石棺墓,大墓并有大型土圹(图6)。墓内一般不随葬陶器,只随葬玉器(图7)。陶器见于冢外,是立置于冢的石台阶处的成排陶筒形器群(图8)。设中心大墓是红山文化积石冢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中心大墓随葬玉器数量较多,个体较大,用料较精,种类较齐全。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类,大都出在中心墓中,是墓主人“一人独尊”



图7 牛河梁遗址第  
二地点1号冢21号墓



图8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4号冢筒形陶器排列情况



图9 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1号冢中心墓

身份地位的象征  
(图9)。

目前，考古工作者已对牛河梁遗址4个地点的积石冢进行了全面发掘，共发现墓葬97座，出土玉器近200件。牛河梁遗址已发现的玉器，除个别为采集品外，

其余全部为正式考古发掘品，且绝大部分在出土时保持着原生状态，这就为研究红山文化玉器的分类与组合、造型、功能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将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sup>[1]</sup>。

## 二

红山文化墓葬随葬玉器数量，一般为3～5件，大型墓葬也只有7～9件，所知最多的一座墓为20件。据初步统计，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红山文化玉器不过300多件，与其他拥有玉器的诸史前文化相比，数量并不多；如与良渚文化出土玉器相比，数量则要少得多。然而，在红山文化墓葬中，经常有出人意料的新造型、新题材出现，其种类之繁多、造型之多变、内涵之丰富深奥，却又在其他史前文化之上。

红山文化玉器依造型大致可以分为10类：人形玉和动物形玉、勾云形玉、筒形玉及玉璧这四大类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主要类型；其次为环形玉和

珠形玉；另还有特形玉、棒形玉、玉兵、工具；至于加工的玉料，因常在墓区发现，也可列为其中一类。

人形玉器，明确的发现只见于牛河梁遗址，共2例。N16M4所出玉人，作平卧吸气状，双肘贴于胸前，眉间额外雕出的圆洞与特意夸大的肚脐，寓沟通上下之意，为巫者作法形象，或可称为“玉巫人”。另一件为三孔器两端的人首装饰。这两件人物雕像都不是平雕，而近于圆雕。

动物形玉的发达，是红山文化玉器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它主要有龙形玉和鸟形玉，还有各种造型的兽面形玉、龟形玉、鱼形玉、虫蛹形玉等。

龙形玉可分两类，一为玦形龙，一为附脊卷体龙（或称“C”形龙）。玦形龙较为多见，以头部突出和如环似玦、肥厚的身体为特点。首部圆睛、短耳似熊，吻部多皱纹，又似猪。牛河梁遗址N2Z1M4所出2件，出土时置于墓主胸部，左右相背而置，头部朝下；有学者指出它们不是挂饰而是下葬时摆于胸前的<sup>[2]</sup>。附脊卷体龙虽也以突出的头部和如环的卷体为特征，但头部较长，吻部前伸，卷体较细，且一般个体较大，背起长脊。此型龙在红山文化遗存中尚无正式出土的实例，所见有出土地点的两例都在赤峰市以北的翁牛特旗境内，这里已非红山文化中心区，而多赵宝沟文化遗址。此型龙又与赵宝沟文化陶器上常见的刻划鹿纹有相近处，于是有学者以为，附脊卷体龙可能与赵宝沟文化有关<sup>[3]</sup>。另有学者认为此型龙时代可晚至夏家店下层文化。按：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随葬品以彩绘陶器为主，玉器少而规格小，自身特点不突出，且两件附脊卷体龙出土地点一带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分布极少，已远离该文化中心区，

[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一）（待刊）。

[2] 殷志强：《红山文化玉龙要素构成辨析》，载于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编的《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3] 敖汉旗博物馆：《敖汉旗南台地赵宝沟文化遗址调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第1期。

所以此说缺乏依据<sup>[1]</sup>。

鸟形玉有鸟、凤和凤首等形状。鸟形玉已发现多件，大都作展翅飞翔状。明确的凤形玉，见于牛河梁遗址N2Z1M17，有内钩的喙端，原型应为鹰，且目为“臣”字眼。牛河梁遗址N16M4所出玉凤为已知鸟形玉器中最大的一件，此件也有内钩的喙，原型也应为鹰类，出土时枕于头下，正面朝上，当是先于墓主人下葬的（图10）。

牛河梁遗址所出土的与鸟兽有关的重要玉器还有：N2Z1M21的一件，片状成形，置于墓主腹部，下部有粗糙面，似为插于另一器件的



图10 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4号墓玉凤出土情况

腹部饰件。N2Z1M26的一件，兽面在上下对称布置，形状似兽似鸮，中部各刻平行瓦沟纹，与收集的兽面璋形器相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件龙凤玉佩。这件玉佩出于N2Z1M23，板状成形，但较一般的板状玉器为厚，玉色呈白而淡灰。龙、凤都为侧面，龙横置，凤竖置，都突出头部，简化身、尾。凤的冠、目、喙和龙的角、目、鼻、嘴都有清楚的交代，各自蟠曲的身、尾十分简略，但两相对靠。其设计之精妙、刻划线条之流畅、造型之神秘，都堪称红山文化玉器中又一件具代表性的器物（见《文

物》2008年第10期27页图二九）。

龟形玉在红山文化玉器中出现率较高。胡头沟墓收集2件，为一龟一鳖。牛河梁遗址出土玉龟达5件。N2Z1M21又出玉龟壳1件，此件龟壳雕出棱线和龟背纹及首尾符号，极为写实又抽象化。玉鳖2件，出于第五地点中心墓（N5Z1M1）中，为墓主左右各一件，一较大而肥厚，一稍小而细，可能有雄雌之别，当为墓主握于手中表现神权的器物。

与龟形玉有关的是斜口筒形玉器。这种形体较大、造型特殊、简而无纹的玉类，是红山文化中最为多见的一种玉类。牛河梁遗址中15座墓有出土，共18件，另采集1件。其中下层冢所出的3件玉器，全部为这种斜口筒形玉器。这种玉器造型极简而有奇特之处：扁圆筒形，一端斜口，另一端近于平口。其出土位置大部分在墓主头下，但也有的在腰侧或手部以下。对其造型与具体功能，说法不一。以前多称为“箍形玉”，顾名思义，其用途与箍有关。新近安徽省凌家滩墓葬所出斜口筒形器被定为龟形器，为破解这类玉器的造型与功能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sup>[2]</sup>。参考凌家滩的新发现，可以对这类斜口筒形玉器的形制作更细致准确的描述：椭圆形筒状；分长面与短面，长短两面有程度不同的错位，形成一端大斜口而另一端为平口或近于平口的小斜口的形状；大斜口及平口（或小斜口）的边缘皆磨薄似刃；平口（或小斜口）一端近边缘处有对称双孔，个别为双缺口，有的还另在长面靠近平口（或小斜口）的一端钻单孔，穿孔位置也与凌家滩所出的相同；出土时大都为横置，也有为上下竖置，一端大斜口与另一端的平口或小斜口，应是前与后的区别。以上特点都与龟壳的特征相符

[1] 朱乃诚：《从兽面玦形玉饰的年代看红山文化与小河沿文化的关系》，在成都举办的“第三届古代玉器与中国传统文化研讨会”论文，载于张忠培、徐光冀主编的《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三）》，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后又以“红山文化兽面玦形玉饰研究”为题发表于《考古学报》2008年第1期。

[2]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年第3期。